

春分

讀享・九州

本期看点

纳税可不是抢劫

老北京人的和气

碳原子如何周游世界？

我听到的欧洲难民危机

晚清大臣学英文众生相

一心做学问，终成陈寅恪

曾国藩一生中最关键的6道奏折

蒋介石对日本的爱与恨

目 录

1 / 卷首语：春意过半，芬芳其时

5 / 纳税和抢劫的区别

15/ 老北京人的和气

25/ 卡本的神奇旅行——《我是碳》读后感

34/ 感悟

39/ 我听到的欧洲难民危机

47/ 陈寅恪：一心读书的楷模

54/ 曾纪泽：“一知半解”学英文

61/ 蒋介石对日本的爱恨情结

73/ 实干家曾国藩的几道奏折

| 卷首语 |

春意过半，芬芳其时

今日春分。

《月令七十二候 集解》有：“二月中，分者半也，此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半。”

一春分两半，倏忽间，春分至，今年的春季竟然已经过半，心里不免有些忐忑，即刻反思这已过去的前半个春天，自己有没有虚度，有没有收获和精进。

有计划地停下来，回望来时路，是一种值得赞许的心态和做法，就像在这春季之分界点春分时节做停留一样。

人生不仅有春天，人生不仅有四季。长途奔袭的高速路上，偶遇小站点，补充给养，整顿精神，是为更好的前行，如此而已。不然，更多人则落入“走了很远，已经忘记自己当初为何出发”的迷局之中了。

不为已经过去的后悔，不为未知的将来彷徨，心念若定，无论何时出发，都是最佳的时间点。

曾国藩在坐了十年冷板凳之后，才初次具有直接向皇帝上奏折的权利，他在一年之内接连上奏四道奏折，以期以传统的方式改变当朝“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的局面，其实当时朝廷的问题，岂是曾国藩一道奏折能解决的呢？曾氏虽有借上奏疏赢取人望之意，但此心境和雄志足可称道。

世事一变，人随之变，也称得上是一种调整和顺应。

在段炼先生的“曾纪泽：一知半解学英语”中，也讲到了非常有趣的一幕。清末民初，在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语境当中，士大夫对于英语的复杂心态也历历可见。晚清外交名臣曾纪泽，时人称他“于英、法二国语言皆能通晓”。

其实，教过曾纪泽英语的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回忆，曾纪泽的口语“流利而不合文法”。曾氏也坦承：“余能西音，然在湘苦无师友，取英人字典钻研逾年，事倍功半。又年齿渐长，自憾难记而健忘，一知半解，无可

进矣。”

无论是一知，还是半解，因势利导，顺应时变，都值得认可。

春季有春分，一春分两半，今日之时，春虽然已经过半，但花香正渐浓。

是为之记。



《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6年3月20日



纳税和抢劫的区别



2015 年末，由九州出版社读·享·团、搜狐读书和新知沙龙共同举办的主题为“财政：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讲座在北京彼岸书店举行。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炜光与知名财经媒体人马国川围绕“财政”这个话题展开讨论，探究了现代财政与古代财政的异同、中国如何更好的完善财税体制改革等问题。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共财政学、财政史。



马国川，知名财经媒体人。先后供职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经济观察报，现任《财经》杂志主笔。



纪彭，《国家人文历史》副主编、新知沙龙理事长。

纪彭：刚才问到马老师关于财政花钱的问题。花钱的问题很重要，我看书里讲到个问题，关于物业费这

个事，最近讨论的也比较多。李老师的这书里有一段介绍，加拿大有一个市镇，物业税有25项，而这个税收用在哪？是在警察、消防、公共卫生，甚至宠物、清理垃圾，还是……这些要向人民群众做出解释。

李老师，在花钱的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也税收。我们知道美国一说到税的问题也很痛苦，老百姓说有两个问题逃不了，一是报税，二是死。大家也都不太愿意交税。但是他们能够把收的钱的去处说的这么清楚，而且也确实能够落得这么清楚，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目前还做不到的。

那么您能不能从这个角度给我们普及一下，他们运作的流程，如何做到制度实施和监管。我们如果要改的话，能够从哪些地方入手？

李炜光：这个问题蛮大的，涉及好多问题。

美国有个电影叫《后天》，故事讲纽约遭遇了特大暴风雪，在很短的时间内，气温下降了几十度，很快所有的管道都冻上了，人们大部分都来不及逃跑，都冻死了。有一小部分逃到了纽约市的图书馆……影片拍摄现场用都是真实的建筑，拍的特别好。

那个片子看完之后我记住了一个细节，可能大家都没注意，这些人逃到图书馆里，图书馆里也冷，没有暖气。但是这些人发现，图书馆里有壁炉，可是没有燃料。图书馆里有书，大家就想烧书。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烧什么书？于是就发生了争议。有的人说这本书可以烧，有的人说那本书不可以烧。一个女孩拿起一本尼采的哲学著作，旁边的人告诉她这可不能烧，烧了以

后我们看什么。



（电影《后天》剧照）

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黑衣小伙，怀里抱着几本非常厚的书，说我拿的东西可以烧，大家问什么书？他答道是《税法》。大家都没问题说可以烧，没有任何人反对。后来这些《税法》真的是很经烧，因为美国的税法号称是比较全的，它放在桌子上你是拿不去的，特别厚。所以一直到几天之后这些人获救，烧的还是《税法》，特别好玩。好多人没注意这个细节，烧尼采大家不同意，但是烧《税法》怎么都没人反对？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电影《后天》剧照）

美国一直到现在，还有占领华尔街运动。一到遇事的时候，还有力量代表底层的民众。往前追溯，独立战争时期曾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无代表、不纳税，其根源来自于“大宪章”。

美国人非常明确的提出这个口号，这就是告诉我们，人在本性上是讨厌税收的。可能没有人会很喜欢税收，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说在财政学习里有个争议，非常有意思，那就是税收的基本的形式特征。我们在课程上教的是**税收三性：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一直到现在教科书还是教这些，说什么东西一旦具有了三性就是税收了。

但对于这点国内外都有讨论的声音存在，它们认为只具备这三性，就称之为税收可能有点问题。拦路抢劫也具有强制性，而普遍性的强制在于，如果一个土匪占领了这一方土地，天天向平民抢劫，平民也必须给他钱，它们愿意吗？让他们屈服的原因是土匪

手里有枪。

而无偿性,也不能说只有税收才具备。土匪抢劫完以后,再给你带来什么事?把钱退给你一部分,这不太可能。

第三是固定性。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这种讨论就有了,而且跟拦路抢劫能区分开的就是固定性,因为拦路抢劫都是临时的,很多是临时起意,本身不是一直想抢劫。所以这就肯定跟抢劫不一样,税收是固定的,是不动的。后来政治学里有一个理论就是坐寇和流寇的理论,一下把这个否定了。

马国川:刚才我都在想说,《血酬定律》里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

民国时期四川某县,是商队必经之路,这条路上有好几拨拦路抢劫的土匪,商人不得不取道此路,而这些土匪都不会放过他们,几番下来,不但利润没了还会赔钱。后来商人就不怎么走这条路了。没收入的土匪就慌了,他们开了个会,商量好从头到尾收一回,比如货物的20%,一万块钱就收2000块钱。

纪彭:等于设了一个收费站。

马国川:对。结果从此以后这条路特别繁华,因为有这些土匪维护治安,并且他也不多收钱。

纪彭:维护治安等于提供公共产品了。

马国川:我就想补充这个段子,但这是真事。国家不就是这么形成的吗?

李炜光:奥尔森理论,《权力与繁荣》讲的就是

这个。《血酬定律》是用中国的事例来说明的，而奥尔森理论则建立了一个犯罪模型，讲的其实也是这个。包括前面讲的那个三性的争论，也能用这个来能回答。

所以税收到底拥有什么样的特征？有位学者曾提出一个理论，他认为税收是有规则的行为，而规则是大家制定的。征税者也要遵守规则，不能说想征多少就是多少，这样就连土匪都不如。土匪要通过联席会议的方式来讨论咱们一共收多少税，然后设立一个收费站，收大家的税。并且，税费还不能太高，太高了同样能把交费的行人吓跑。所以你得收费要适当，收太重了还是没人敢走，收太轻了土匪没收入。

所以税率的制定是很科学、很有学问的，这都是需要开会决定的。最后他将此解释为规则行为，既然是规则行为，是事先制定好的，也就是征税这一方和交税这一方大家都认可的东西那才叫规则，是不是？一旦成为规则行为，交税的人也认可了，那么就会出现积极的缴税者。

比如说刚才说的人人都不想交税，但是现在有规则了，规则大家同意，那就是人人都得遵守这个规则。哪怕反对，规则出来以后，你也得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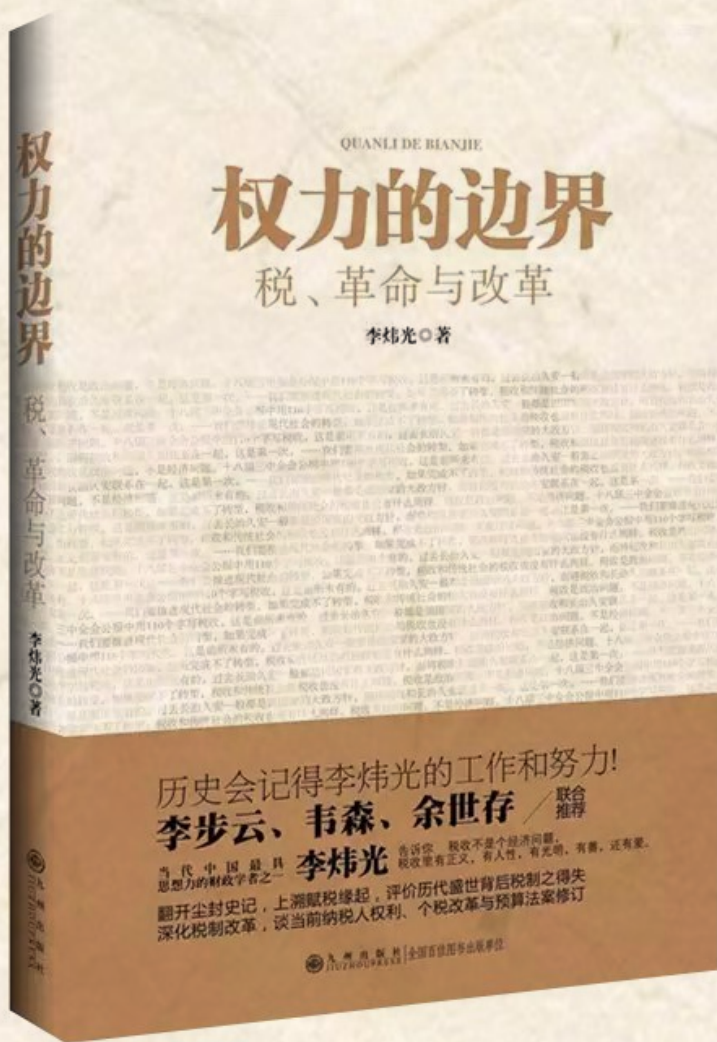
这个时候出现积极的缴费者理论上是成立的。比如说我愿意缴税，我爱国，规则上不用强制我，我也会去主动缴税。但是你绝对不能说有积极的被抢劫者，这不可能。这个理论上是绝对不成立的，这就把税收跟抢劫区分开了。

理论和学术是要较真的，你把土匪跟政府的缴税来一起比较，很多人是不能接受这个质疑的。但是这是个学术问题，必须要跟他讲清楚。

推荐阅读：《权力的边界》

李炜光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李炜光先生近年来关于中国财税问题的论文和评论文章，反映了他近年来对中国财政制度改革和立法修法过程中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成果。阅读本书，看李炜光如何从公共财政理论的视角，评析现代中国财税制度之短长，明晰税收与权力的边界，解读税收·改革·革命的关系。

“讀·享·團”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老北京人的和气

◎陈鸿年/文

中国的地方,差不多都走遍了,若论对人的和气,不欺生,哪儿也不胜北平……



（老北京照片）

（一）

“不经高山，不显平地。”从放下书本，衣食奔走，这二三十年里，使我们知道，故都最好的一个乡风是：和气、敦厚。中国的地方，差不多都走遍了，若论对人的和气，不欺生，哪儿也不胜北平。

就拿新到一个地方，道儿不熟，向人打听打听怎么个走法；或一时记不得了，向人问问路这件小事儿来说：

在旁的地方，所碰见过的，也不用提是哪一省，有的对方连理也不理，就像没听见，有的三个字：“不晓得”，就把你打发了。有的虽然告诉你了，可是论亲切、热情，比北平可差多了！

在北平若有个外乡人，因为路生打听道儿，遇见知道的，他必详细的：“你从这儿往东，一直走，见口儿往

北拐，第三个横胡同就到啦！”

他能掰开了、揉碎了地告诉您，甚至带着您走一段路，而指给您。

比如您问路，正赶上他也不晓得，他会马上告诉您：“我不在这溜儿住，左近我也很生，您问问把口儿的小铺吧！”甚至他就：“掌柜的，劳你驾！××胡同，在哪儿您呐？”

至不济，他也是答复您：“这块儿，我也不大熟，您再跟旁人打听打听吧！”他决不会不理您。



有的乡下人，一进崇文门，就打听“雍和宫”在哪儿？人必告诉他：“喝！走路去，这绷子可远啦！前面的牌楼，是单牌楼，看见了吧！一直往前走，再一个和这个一样的牌楼，是四牌楼。一直再走下去，到了北新桥，北边儿不远就是雍和宫了。”

若说您不知道的地方，向人打听，而碰了一鼻子灰，在北平土生土长几十年，不但没有碰见过，也没有

听说过,可以说没有这回事。

(二)

一个地方住久了,左邻右舍,都成熟人了,见面的称呼,不像现在,张的张先生,李的李先生。到北平都是论着辈儿叫的。比如同事之间,自是称兄道弟的。可是谁家一有长辈,一定是张的张大爷、张大妈,(这儿所称的“大爷”可不是普通的尊称了,而是伯父的意思)李的李大叔,李大婶儿。这点意思,便是住在一块儿,便是一家人似的。

像每天一清早儿,街里街坊的,一见面,彼此都点头哈腰儿的:“您早起来啦!您喝茶啦!”或者:“您去遛弯儿啊!”



(隆福寺遛弯逗鸟的人)

彼此见面，点头不说话的，都很少见。若说住在一条胡同，谁也不理谁，从来没有听说过。不像现在住在一个院，一个大门口儿里的同事，彼此见面，属龙井鱼的——望天，真是年头儿赶的！

在北平同院住街坊，女的有时带着孩子，回娘家玩一天，在锁上门走的时候，必对同院说一声：“我带孩子看他姥姥去，劳您驾，您给听点门儿。”

“是啦！您去吧！问姥姥好！大舅母好！好好玩一天吧！散散心！”

等晚上回来的时候，一见面：“李大婶儿！劳您驾，叫您看家！”

“哟！看不到！姥姥好啊！”

“都好！都好！都问您好！”



（民国时期老北京人在晒太阳）

故都的风俗，这样儿的街坊邻居，也许有人认为太“啰唆”。不管怎么说吧！总比王小过年——谁也不理谁，好点儿！

现在有的大杂院，眼看刚会走的孩子，跌倒摔破了皮，谁也不肯多伸一把手儿，这倒是不啰唆，这还有点人情味儿么！

比如在北平，孩子有点不舒服，老娘儿们拖着在门口儿遛遛，叫隔壁街坊看见了，必然问：“孩子怎么啦？时令不正，可得多留神！赶紧抱他到西城小孩王那儿，一看准好！人家可是好几代的名医，小孩儿，不会说，不会道的，赶紧去看！”准有住街坊，休戚与共的一点意思！

比如原来住街坊，许久不见，尤其像我们常出门儿的人，要是和老邻居的老太太碰见，可就热闹了：

“哟！这不是二爷么？老没有见啦！老爷子好！你妈她们娘儿几个好！孩子们都好！”差不多人人都问到了。

“二爷还住那儿吧！我也忘啦，你们自个儿的房子啊！近年事由儿顺心啊？”

“李大妈！家里都好！我在外头，这年头，总算不错，托您的福。明儿您上我们家来啊！找我们老太太斗四班儿，老朋友儿啦！”

“好！我去！回去问你妈好，秃儿他妈好！”

(三)

在胜利那年，正有十年以上没有回家了。在到家的头一个月，喝！左邻右舍，街里街坊，亲的热的，一见

面，这一套，现在您叫我学，我都学不上来了，记得我去看我念《三字经》、上《论语》时的师娘，老太太快七十了。

一见面：“哟！陈家的老二啊！前几个，我就听说你回来了，这趟出门，可真够瞧的，隔在外头啦，十年了！你在哪儿发财哪？”

“师娘！我一向在昆明！”

“昆明是哪儿啊？”

“在云南。”

“啊！云南？万里云南啊！听说净走，也得走半年才能到，可真了不得！你们的腿，可真长！一走就是一万里地！可真开眼哪！”

“不用说，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吃过了，从小我就看你要强！你妈有你这么个儿子，可真造化呀！”

“师娘！您倒硬朗啊！老师的事儿，正赶上我不在家，过两天，我得到坟上，烧纸去！”

“唉！什么烧纸不烧纸的，我也一年不如一年啦！一把老骨头，不定哪一天？……儿子不争气，媳妇什么也不会，你们都混好啦，我这个不成才的儿子，你得设法给他弄碗饭吃，别叫他给你的老师丢人现眼啊！”

讲到北平的土著，对人的客气，不用说旁的地方人不成，就是我这北平的“发孩”，想起来，自个儿也真恨自个儿！

北平讲究见人称兄道弟，不笑不说话儿，有一点求人的事儿，先道“劳驾”，然后说话。比如说一不留

神，踩人脚一下，赶紧地一脸的抱歉神态：“哟！没有瞧见，踩了您啦！我给您掸掸土……”这样双方怎能发生打架、口角的事儿？怎么能吵起嘴来？



说到北平的和气，和对人的义气，肯帮助人，我总忘不了一件事：当舍间于民国二十六年，赴开封为四舍弟完婚时，家中只有弱妹及祖母二人，不料七七事变爆发，交通中断，而家祖母亦恰于此时病逝，家中并无一

人办理丧事。

不料隔壁街坊，德寿堂药铺掌柜的李少甫先生，挺身而出，他说：“陈家正赶上家里没人，老太太丧事，没有人办，都是几十年的老街坊。这件事，不能袖手旁观，我作主意办了，等陈家回来，有什么沉重，我都担了！”一拍胸脯，完全做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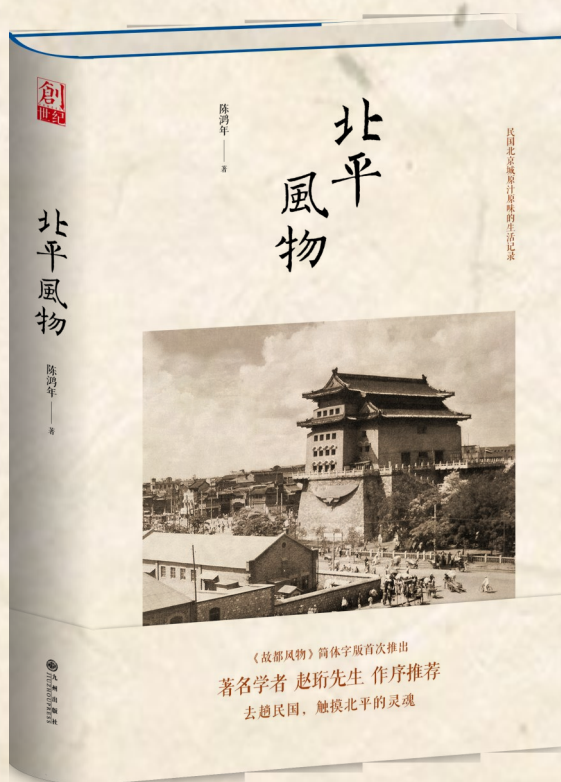
彼时家祖母的寿材寿衣，都是早准备好的，只是“接接三”，念一棚经，反正照着北平差不多的丧事，又找到舍间几位亲故，一商量便办完了。家祖母灵柩，暂停夕照寺，一切等我们回去再说。

论关系，舍间与李少甫先生，没有一点儿亲戚，只是隔壁住街坊几十年，彼此有“份子”，没旁的，这是燕赵慷慨、义气的风气，随时随地可以发挥出来！

本文选摘自《北平风物》

陈鸿年 著

九州出版社2016年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回忆老北京风物的专题之作。作者久居燕京之广博见闻与别具风格之妙笔，堪称字字珠玑，妙语天成，深情动人。本书可供今人了解民国时期老北京的生活细节，是研究北京历史、地理、业态、民俗、方言、饮食等方面的重要文献，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卡本的神奇旅行 ——《我是碳》读后感

◎陈俊荣/文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类生活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与此同时,人类的生产生活,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对全球的资源、环境与气候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类生活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与此同时,人类的生产生活,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对全球的资源、环境与气候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全球环境与气候的变化,深受世界各国的重视。近二十年来,全世界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气候大会,集体研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2015年底,世界各国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气候大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各国最终达成妥协,通过了《巴黎协定》。该协定指出,各国将加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努力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力争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为什么全球如此关注气候变化?为什么每次气候大会,各个国家都会争论不休?什么是温室气体?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又是什么关系?怎样迅速地了解这些问题的常识?

在这里,我向您推荐一本能够回答上述问题的科普书籍。这本名为《我是碳》的科普著作,写得非常生动通俗,介绍了许多关于低碳的科学知识。该书用拟人的手法,站在一个碳原子的视角,探究了二氧化碳、人类工业活动和气候变暖的关系。

小说的主人公“卡本”,即英文单词“carbon”(碳)的音译,作为一个碳原子来到地球,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变成煤,在地下沉睡了三亿年被人类挖掘燃烧后变成二氧化碳。卡本怀着为人类造福的美好愿望,探寻自己的伟大使命,却发现人类已经不需要更多的二氧化碳,并且在想方设法降低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卡本感到非常委屈和疑惑,下定决心追根溯源,问个水落石出。



(书中插图)

他遨游天空、大陆、海洋、岛屿、北极，体验气候变化对地球各个角落的影响。他向老榕树、云碳、果碳、牡蛎、红发卡、陨石寻求答案，终于明白：空气中合理的二氧化碳浓度能够保持地球的正常温度，但是由于人类过度的工业活动，排放了过量的二氧化碳，使得全球气候变暖，还会导致极端天气、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等灾难。

这本科普读物运用小说的浪漫手法，将原本枯燥无味的低碳知识，以卡本周游世界的有趣经历形象地表现出来。作者让读者同卡本一起不断产生新的疑问，主动去探寻低碳的相关知识。后来，卡本意识到不是他的身体在运动，而是他的思想通过碰撞，有选择地从一个分子转移到另一个分子上，是思想的传播影响诸多碳探寻自己的使命。卡本可以通过控制思想迅速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那微小的卡本？人体由包含碳元素的有机物组成，食用碳元素通过光合作用演变而来的食物，新陈代谢，物质变换，唯有思想证明我们个体的存在。思想无形无相，力量却是无穷无尽。



(书中插图)

《我是碳》这本书的出版和发行，将像卡本思想的传播一样，使读者认识到人类不当行为造成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衣食住行习惯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而消费者生活方式的低碳化将使企业生产低碳产品，调整生产模式，进而带动整个工业结构朝低碳方式转变。我们每个人看似渺小，但是世界正是由我们这一个个“卡本”组成。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思想影响行动，行动改变世界。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是碳》这本书引导读者从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地看待人类行为。卡本在老榕树

的启发下寻找陨石，陨石从宇宙的角度告诉卡本：人类的思考方式没有对与错，只有主动和被动。人类认为自己是主宰者，影响着世界的变化。但是物种的出现和消失在地球上从未停止，而地球依然如故。地球是在以极端天气、气候变暖等残酷现实提醒人类彻底改变，保护自己本身。这本书同样是以“卡本”这个旁观者的身份在审视人类行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正在遭受严重破坏，但是还有人认为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太阳黑子运动、火山喷发等自然原因，炒作气候变化是政客的阴谋，是国家相互遏制的工具等。如果国家之间继续为各自利益争论不休而无所作为，企业依然把大气当成“公地”肆意排放污染气体，民众只是抱怨，而不愿改变自己高碳的生活方式，那么大气永远只能是“公地悲剧”。



这本书的最后，卡本通过光合作用回到了一棵生长在龙泉寺的银杏树里。品味檀香的芬芳，远眺“道

德”的警示,看日出日落,察万千气象,见证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息息相通。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先基本上都是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之上改造自然。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哲学思想。而西方哲学中有“人定胜天”的成分,人类企图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征服大自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现在已经面临着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恶化,雾霾笼罩,食品污染,癌症高发的严峻局面。要解决这样严峻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是解决信仰缺失的问题。

《我是碳》呼唤着人心向善,此善乃大善。善待自己,善待生命,善待万物。思想虽无形,却可感人心,化万物,力量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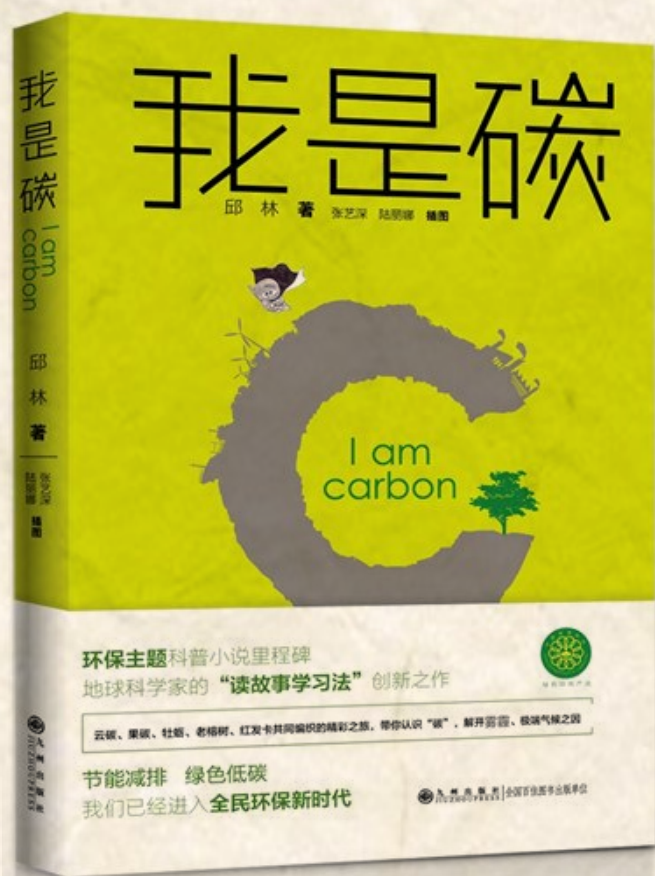
公地悲剧: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而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

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推荐阅读:《我是碳》

邱林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我是碳》为长期从事二氧化碳减排研究和实践工作的专家执笔写作的科普小说。内容主旨聚焦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天气、气候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二氧化碳。小说内容分为十七章，每章均阐释了有关知识，同时每章都配有中央美术学院专业画家的铅笔插画，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可为广大读者普及碳元素与大气环境的关系等有关科普知识。

小说的主人公叫“卡本”，即英文单词“carbon”

(碳)的音译。小说以拟人化的文学手法,站在卡本的视角讲述了他作为一个碳原子来到地球,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变成了煤,在地下沉睡了三亿年苏醒之后,惊奇于周遭所发生的一切,并一步步探索地球发生的颠覆性改变。

它发现地球上的统治者——人类极其讨厌二氧化碳家族,为了找寻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卡本开始了环游世界的奇异旅行。在探索的过程中,他途经天空、大陆、海洋、岛屿和北极这些气候变化所施加影响的每个角落,他在旅途中遇到了云碳、果碳、老榕树、牡蛎、红发卡等,有趣的经历让他知道了气候变化并得到启示。最后,对二氧化碳、气候变化、人类三者之间的关系大彻大悟的卡本,通过光合作用回到了一棵生长在千年古寺的银杏树里。

卡本的经历,有许多发人深省的地方,不得不让人反思:相对于地球的寿命来说,人类的历史很短暂,却对地球和气候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作为今天地球的主人,我们应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些什么?



感悟

©Shaw/文

道家言,道为万物之始也。道者恒常,为万物之根也。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庄子曰：“芴漠无形，变化无常。”

佛曰：“生住异灭。”

上来先立宗旨。四季常有，故曰天下有常道；四季变化各有不同，故曰天下亦有变化万千。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其始为夫子删述五经，及其罢黜百家，则专立五经为天下正道。五经专有一部为《易经》。其所述者，天下变化而已。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化而为六十四卦。取其为相反相成，相互关联。每卦各自独立，各有意义。而卦卦互为关联又互相变化。荀子所说尧存可言立而为乾，桀亡则可配之灭而为坤。天下不为乾则为坤，故可说之天行有常。此儒家变常之大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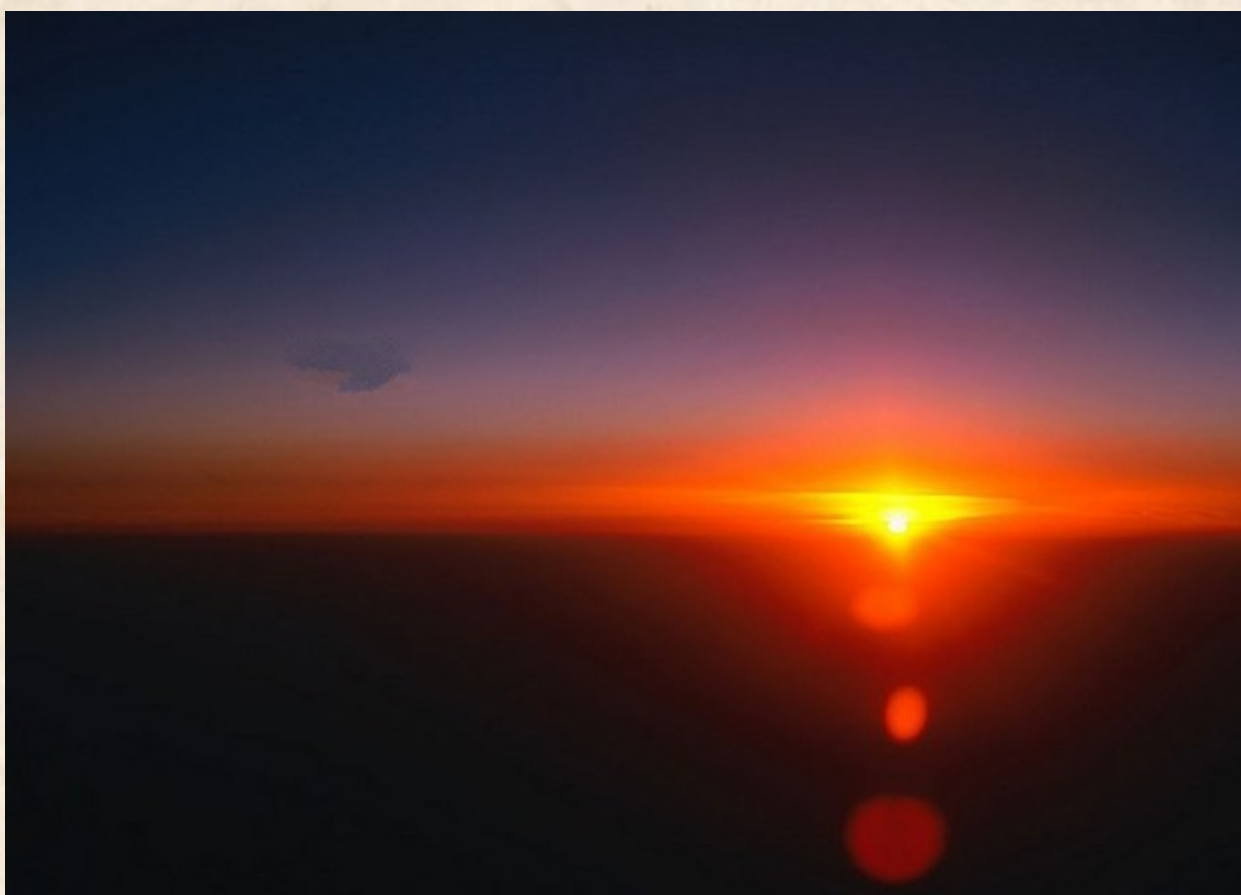


道家言，道为万物之始也。道者恒常，为万物之根也。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道之变也。一部《道德经》无处不是在言变与常道。庄子逍遥，因其参透万物之实质也，其知一切之核心为之道，道变化而为万物，故其遨游天下，畅行不悖。

中国之学术最初可探之源应为周公治礼作乐，后孔子继之，孟子传之，一脉相承，虽经秦火然道统不断。汉唐传经学。至于宋代濂溪开而程朱诸位阐扬而为理学，至明未衰。异族入关，理学不合时宜，船山继宗羲、留良、顾炎武……明末诸老之精神与学养而开以训诂考据为核心的汉学一代，至于南山而光大之……此则变化之道也。然则，中国学术之心无非是仁，其体乃三纲五常，其用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一以贯之，历千年而未有更异也。此当为常道也。



印度传统信仰物之核心为四大“地火水风”是，地其坚固性，火其温度性，水其湿润性，风其运动性。比之四季则可截然有对，春季万物孕育即可配之地，夏季骄阳似火即可配之火，秋雨绵绵配之水，印度冬季无雪然其风大。在四大之上有一“空”大，认为四大皆由“空”大发来，故曰“四大皆空”。其于道家道生万物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进而佛陀兴出于世，哲学思想皆由反对传统而来，然其名相也兼收之并有之发展。佛陀认为事物的发展无外乎“生住异灭”，宇宙初劫而生，住劫住世，坏劫变异，衰劫四大灾起尽归于空。空则为常道，生住异灭则为变化也。



西人拉瓦锡言物质守恒，认为从原子说物质从甲易而为乙其物质守恒不变。可说物质变化为变，守恒则为常。也从科学证明了道之存在。

近人则好言变化，而少言永恒之道。此于当世之人重利轻义不无关系。利者变化之道也，今有利者一，明日未必仍为一，人之趋利性必求而为二为三，乃至为千万。而义，古之道也，亘古而不为之变异。求利者，寤寐求之，辗转反侧，求之不得，心无有安。求义者，心怀坦荡，浩然之气常养于胸。其变常之相昭然若揭也。

天理昭彰，天运循环，然却时时不同，处处有异，人生世界无外是在这天人合一之下的变常中，循环往复。



我听到的欧洲难民危机

◎冯 萍/文

2015年9月马上启程回学校的时候，看到电视上不停地滚动欧洲爆发了难民危机的新闻。因为叙利亚战争，约有34万非法移民偷渡到欧洲，其中占比最大的是叙利亚难民……



（叙利亚难民）

2015年9月马上启程回学校的时候，看到电视上不停地滚动欧洲爆发了难民危机的新闻。因为叙利亚战争，约有34万非法移民偷渡到欧洲，其中占比最大的是叙利亚难民。接着默克尔打开国门，欢迎难民入境，匈牙利警察和记者虐待难民……

当时，对即将到来的华沙旅程，非常期待，马上就要到欧洲，很想亲身感受或者听到欧洲人是如何看待难民事件的。

2015年10月来到了波兰，本期待走在街上会多一些中东人的面孔，然而却诧异地发现波兰一如既往的平静，波兰依然一如既往的“Polish”。走在大街上，没有发现太多的难民，后来才知道波兰刚好举行了换届选举，法律与公正党党政当政，这是一个非常有民主主义的右翼政府，有些偏离欧盟的政策，反对接受难民。



一个星期天，在波兰大街行走的时候，收到一张传单，上面是加入“反对难民”的游行示威的宣传，星期六，果然亲眼看到了游行示威的队伍，在华沙老城，公交车全部改道，前面有一些警察护送，一位游行领导人开车走在队伍前面带领游行队伍高喊着，“欢迎乌克兰人，反接受难民。”

我和一个立陶宛的记者朋友讨论了这件事，她问我对难民的看法，我就告诉了她我的所见，还有波兰的外交部部长说“可以对难民提供经济帮助，却不愿意开放国门，接受难民的消息。”她听了一脸担忧，她是非常支持接受难民的，既然战争已经发生，是不可以置这些无家可归面临死亡威胁的朋友不管不顾。

一次偶然的机会，和罗马尼亚的同学谈到了这件事，她说罗马尼亚不欢迎欧盟发配的难民指标的政策，因为难民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反驳说一次听瑞典的官员曾来我们学校讲座，他说瑞典欢迎难民，并努力让这些难民同化，让他们融入瑞典的社会，还说瑞典的历史有很多都是由“难民”创造的，比如二战时期瑞典接受了很多难民，这些难民，现在的少数人种，诸如伊朗人，要比瑞典人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为瑞典的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说现在做的，是尽快让新接受的难民融入这个社会。

罗马尼亚的同学不以为然地告诉我，最近瑞典人也开始排斥难民了，因为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还有难民占有了当地人的资源。果然，最近察看bbc的新闻，拒绝8万难民的申请，把他们驱逐出境。

上个学期，选了一门世界政治的课，教授讲了一个“难民危机”的专题，说现在的移民超出了欧洲的负荷，很多经济移民冒充了难民来到了欧洲，因而成为危机。这时，一位德国的男生站起来，反驳教授道他不认为现在的难民是个危机，只可以说是移民潮，危机是被媒体夸大或者被政治家炒作，涉及到种族歧视。让所有的同学不禁对这个想法大跌眼镜。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还为我们详细地做了一次展示，展示了他的难民的定义，还有他对难民的态度，非常“理想主义。”

在圣诞节德国发生了性侵事件之后，我再次遇到了这位德国男生，又和他讨论了这件事，问德国的生活

是否受到了影响，他不以为然地笑笑说，在德国每天都有性侵事件发生，媒体都不会报道，但是如果这件事是由难民做的，媒体就会大肆渲染，他还告诉我今后他要读牛津大学难民研究的博士。

有一位柬埔寨的同学骚乱当天正好在场，他和我回忆当时人群都急着往一个方向跑，他也随着人群跑，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后来会华沙的时候，机场的安检格外严格。

我圣诞节的时候到了马耳他，本期待会遇到很多难民，但是那个国家相对来说还是很安全的，整个假期马耳他是一座空岛。到了圣诞节结束，27号回国时，才在街上发现了零星的难民，当地人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后来与我的波兰教授谈及这件事的时候，他也感到非常诧异。他是公民纲领党（波兰前政党），前波兰总统的顾问，他极其不喜欢匈牙利政党的政策。

我问波兰同学为什么不接受难民，原因主要有：

1. 波兰是一个宗教国家，天主教在波兰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大的地位；
2. 种族偏见；
3. 波兰是一个非常同一化的社会。



Murschida Fausi spricht mit Verwandten, die noch in Madaja sind. Die Verbindung über Internet oder Telefon funktioniert nur selten. Vorn ihr Mann Mahmud, hinten Tochter Kaukab

„WIR SIND UMZINGELT. ES IST NICHTS MEHR DA“

einhalb Kilometer liefen sie mitten durch das Schussfeld der Scharfschützen, dann waren sie außerhalb des Belagerungsringes. Murschida liefen Tränen über das Gesicht. Sie verfluchte alles. Den Krieg. Assad. Die Rebellen. Ihre ganze kaputte Heimat.

„Als wir gingen, ist ein Teil unserer Seele gestorben“, sagt Murschida heute. „Hätten wir auch nur die winzigste Hoffnung gehabt, wir wären geblieben“, sagt Mahmud. Im Hintergrund tobt seine Tochter in einem rosafarbenen Tutu durch die Kellerwohnung. Der kleine Bruder spielt mit einem deutschen Polizeiauto auf dem Boden. Geschenke der Kerns, die die Kinder in Detmold unter dem Weihnachtsbaum fanden.

In den letzten Tagen haben Mahmud und Murschida viel gebetet. Aus Syrien kommen zum ersten Mal seit Monaten Nachrichten, die ein wenig Hoffnung zulassen. Diese Woche Hilfskon-

Doch der für Lebensmittelhilfe zuständige UN-Koordinator in Damaskus hatte sie aufs neue Jahr vertröstet. Bis zum fünften Januar seien fast alle seiner Mitarbeiter im Urlaub. Auch darum kommt die Hilfe so spät. Bei seinem Besuch in Damaskus am vergangenen Wochenende ließ der UN-Sondergesandte für Syrien, Staffan de Mistura, die Lage in Madaja unerwähnt. Die für Ende des Monats geplanten Friedensverhandlungen zwischen Regime und Rebellen stehen auf Messers Schneide. Da wollte der Topdiplomate die Assad-Leute lieber nicht vor den Kopf stoßen. Die Vereinten Nationen haben schon lange aufgegeben, die Toten in Syrien zu zählen. Auf ein paar Dutzend mehr oder weniger kommt es ihnen offenbar nicht an.

Nach einem Spaziergang durch die Straßen von Detmold mit ihren Einfamilienhäusern, den gepflegten Vorgärten und Vogelhäuschen setzen sich die Fausis zu den Kerns in den Wintergarten. Mahmud nimmt das Handy und tippt eine lange Nummer hinein. Es ist die Nummer der kleinen Schwester, die Mahmud seit Monaten nicht erreichen konnte. Heute soll es endlich klappen. Die Leitung knack-

和一位刚从德国来学生物的交换生交流，她的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德国人。她告诉我她在德国离法兰克福很近的一个小镇居住，在镇里有两个难民营，每天都有警察给这些难民上课，告诉难民的行为举止规范，还给我出示了照片。

我问她现在德国是否不太安全，她说主要是对于人口有些失去控制。她给我讲最近媒体在一个名单上发现了一个 IS 的头目，潜伏在德国，于是警察开始排查搜索，最终在一个极小的镇里的难民营找到了他，媒体报道出来，很多人都感到后怕，出了一身冷汗。

我说相比之下波兰是安全的，然而她的脸色微变，

给我拿出一本杂志，说这就是他们每天看的东西。杂志上有一张饥饿将要垂死的小孩瘦骨嶙峋的照片。她告诉我，政府军、反政府军各自包围了叙利亚的一个城镇，国际救援无法到达，包围圈里的人没有食物和水，只好活活饿死。这些人幸运的逃到了欧洲，所以德国很难对这些人说不，因为他们简单的一句话就决定着其他人的生死，然而这些导致德国接受了越来越多的难民，造成了德国社会的不安定。



她还给我看了一张照片，讲道杂志上说德国的一些少数族人给叙利亚的亲人打电话，听到的只是亲人，“I am dying.”她告诉我是不会对她波兰的姑姑讲这些的，我和她良久的沉默。

刚送走一位土耳其的交换生，临别时，我问她如果回国遇到战争会怎么打算，她有些愤世嫉俗地笑笑说“I hope i can survive.”（她希望自己可以活下来。）前不久，在facebook上看到她在最近的土耳其安卡拉汽车炸弹袭击期间报了平安。

我和德国朋友说“Refugee crisis is a real problem.”(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突然感到话题越来越沉重,一切都是战争罪恶的根源,导致多少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多少人面临着生离死别。很庆幸自己幸福地活着,于是我格外地珍惜身边的人。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陈寅恪：一心读书的楷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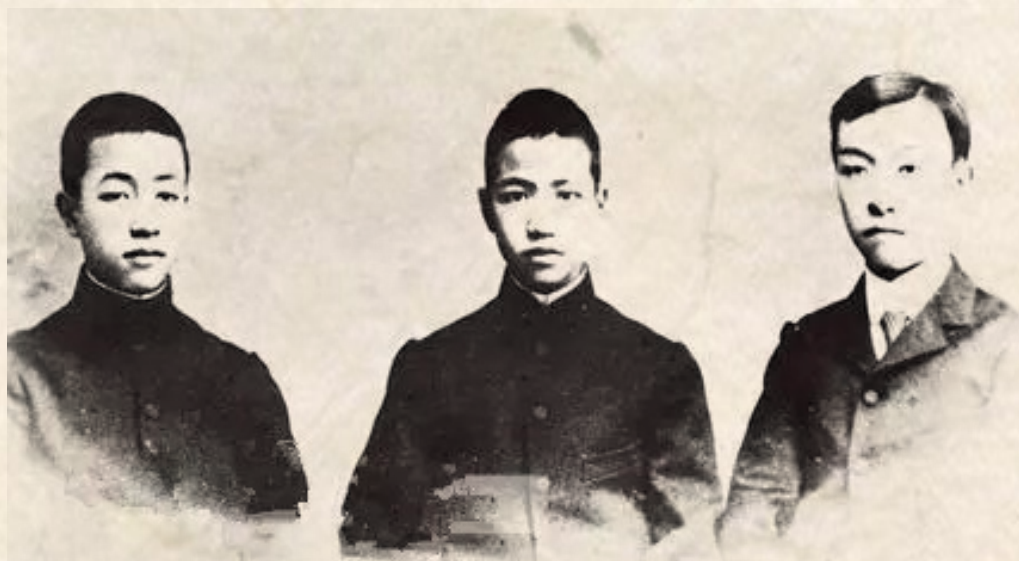
◎ 魏邦良/文

陈寅恪 13 岁留学日本，之后又曾赴美国、法国、德国留学，长达 20 余年，其中在德国留学时间最长，生活也最为辛苦……



(陈寅恪)

陈寅恪 13 岁留学日本，之后又曾赴美国、法国、德国留学，长达 20 余年，其中在德国留学时间最长，生活也最为辛苦。当时，陈家家境日衰，无力资助，而官费因政局动荡常常停寄，陈寅恪因此时常陷入穷困潦倒的窘境。其长女后来是这样追记其父的留学生活的：“父亲在德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1904 年日本留学时的三兄弟，右衡恪、中寅恪、左隆恪)

德国人一般不食猪肉，猪的内脏特别便宜，所以陈寅恪和其他几个留学生在饭店吃饭时，点得最多的菜就是炒腰花。不明就里的人以为陈寅恪嗜吃猪腰子，其实他是为了省钱。

一次，赵元任夫妇去德国游玩，陈寅恪、俞大维请他们听歌剧，两人把赵氏夫妇送到剧院门口，就转身离开。赵元任夫妇邀请他俩一道去欣赏，陈寅恪只得如实相告：“我们两个只有这点钱，不够给自己买票；如果买，就要吃好几天干面包了。”



（赵元任（左一）、杨步伟（左四）夫妇及侄女
与胡适（左二）夫妇在胡适家门口）

当时，海外留学生中不乏追求享乐、只想投机取巧混张文凭之辈，而陈寅恪和俞大维则是心无旁骛一心读书的楷模，人们公认他俩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是“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

对那些以留学为名行玩乐之实的“欺世盗名”者，陈寅恪极为不屑，曾对好友吴宓说：“吾留学生中，十之

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

与这些“欺世盗名”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求学位只求学问的陈寅恪。著名学者萧公权在文章里曾特意提及这一点：“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陈寅恪先生就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取巧。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



（1922年夏，陈寅恪（立排左二）与章士钊（立排左四）、陈西滢（立排右四）、傅斯年（立排右二）、何思源（前排右二）等在德国柏林。时章士钊已届不惑，而陈寅恪三十三岁）

陈寅恪的侄子也曾问他为何在国外未取得学位，

陈寅恪：“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其侄子后来就此事问俞大维，俞答：“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期间，生活最苦，但用力却最勤。他这段时间留下的读书笔记多达64本，其中文字涉及20多种，由此，我们可看出他治学范围之广，治学功夫之深。



（1957年陈寅恪与助手黄萱在工作）

陈寅恪读书往往眼到还须手到，也就是随手批注。他的藏书，只要读过，均有密密麻麻的批语。所谓的批语也就是他读书的心得、体会、感想等。他的学生曾在文中介绍过他的这一习惯：

批语俱写于原书上下空白处及行间，字极细密，且无标点。批语多时竟至原书几无空白之处，复又写

于前后页。从字迹大小及墨色看,同一相关内容的批语,往往不是一时写成,前后时有补充或更正。设想先生当时读书,有所得时,即随手批写于书上,以为以后撰写论文时的材料,只是备自己参考,并没有直接发表的打算,因此书写颇不规整……(王邦维文,刊《中国文化》1990年春季号)

其高足蒋天枢也有文字提到陈寅恪的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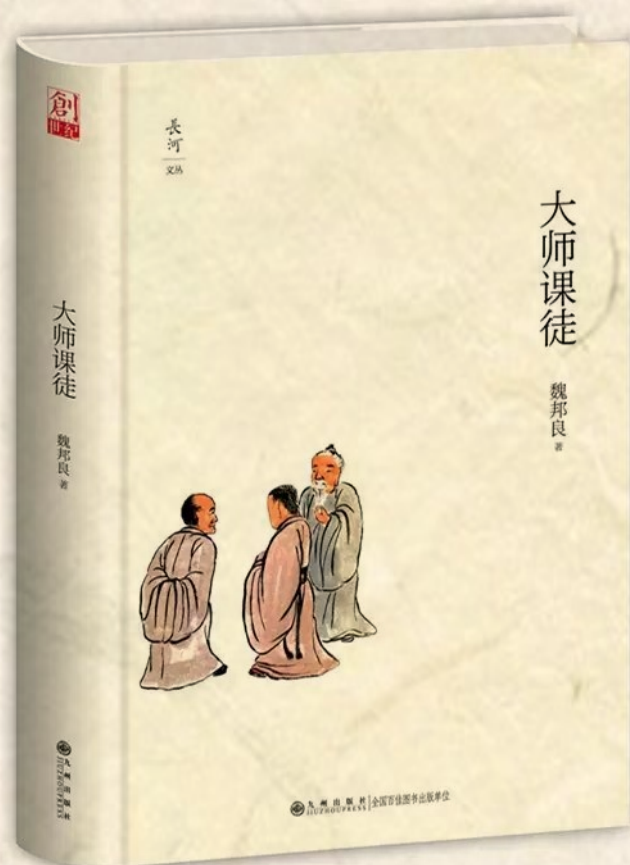
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字细小处,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两次,具见用力之勤劬。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以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

读书时随手批注,一方面表示陈寅恪读书之严谨,另一方面,也为他日后写论文、做学问打下基础。事实上,他的许多重要论文,都是通过对批注进行整理、加工、连缀而完成的。陈寅恪曾多次翻阅《世说新语》,写下大量的批注,可惜的是这部书因战乱丢失了,否则他又会为我们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产。

本文选摘自《大师课徒》

魏邦良著

九州出版社2016年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以十三位民国学术大师及其弟子的关系为线索，着力梳理大师们在教书育人、文化传承方面的卓越贡献。并通过特定的角度，描摹大师丰神，再现大师风采，追溯他们立足杏坛春风化雨的人生。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曾纪泽：“一知半解”学英文

◎段 炼/文

1864年，户部尚书董恂应英吉利使臣威妥玛之邀，将后者所译美国诗人朗费罗（Longfellow）的诗歌《人生颂》，修订成一首古意盎然的七言古诗……

1864年，户部尚书董恂应英吉利使臣威妥玛之邀，将后者所译美国诗人朗费罗(Longfellow)的诗歌《人生颂》，修订成一首古意盎然的七言古诗。据钱钟书先生在《七缀集》中的考证，这也是第一首汉语翻译的英文诗歌。有趣的是，虽然任职“佛林敖非司”(foreign office, 总理衙门)并曾出使多国，董恂却一度误认为朗费罗是“欧罗巴人”。大概在董恂的心目之中，全世界能说英语的国家，只有位于“欧罗巴”的“英吉利”了。



(董恂)

这也难怪，以当时美国的国际地位，的确远不及老欧洲那样如日中天。同治年间，奕訢在奏疏里还特别

强调，美国人说的话与英国人说的话“大略相同”。可见，他也不确定二者其实为一。到了光绪年间出版的《英字指南》当中，甚至专辟一节，名叫《英国语与美国语无异》。以今人后来居上的优越感观之，士大夫的认知确实浅薄可笑。然而，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视野下，普通读书人对于英语的疏离，其实也相当“理直气壮”。汪康年曾经在笔记中记录下两则趣事：“通商初，万尚书青藜云：‘天下那（哪）有如许国度！想来只是两三国，今日称“英吉利”，明日又称“意大利”，后日又称“瑞典”，以欺中国而已！’又满人某曰：‘西人语多不实。即如英、吉、利，应是三国；现在只有英国来，吉国、利国从未来过。’”



汪康年

就在士大夫争论“英吉利”到底是一个国家还是三个国家的时候，同文馆和方言学堂也在京师、上海、广

州和内地陆续开张。这些学习外语的专门学校，却命名为“同文馆”、“广方言馆”，倒也颇有趣。当时的英文教材不忘在序言当中强调，学习“西国语言”是为了实现“书同文、行同伦”，以远播儒家声教，而非自我矮化。早期的英语教材尚无音标注音，只能以同音汉字代替。1855年出版的《华英通语》中，编著者注 few 为“非夫”，同时又在两个汉字下面注明“合”字，表明二字要合读（拼读）；又如，注 fat 为“呈特”，而“特”字小写，表明轻读。对于这一点，细心的曾纪泽特别留心：“昔吴子登太史口不能作西音，列西字而以华音译读，是为奇法，其记悟亦属异禀，非人人所能学也。”

有意思的是，由于近代中国人接触英语，往往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而逐步推广，因此，所谓“华音译读”也大都采用“因地制宜”的方式。这让借助各地方言作为读音标注的英语读本，在那一时期如百花齐放。唐廷枢是广东人，因此他编注的《英语集全》采用粤语标音；常州人杨勋编注的《英字指南》，自然就以吴语记音。中式英语里的粤腔和吴调，也因此应运而生。今人熟知的“鸦片”（opium）和“沙发”（sofa），正是这两种“翻译腔”的代表。后来以编写《模范英语入门》闻名的藏书家周越然，回忆自己幼年（1890年代）偷听英语课，听到老师将“good morning”（早上好）读成“各得骂人”，不禁大吃一惊：“西人既要相互祝福，何故又‘各得骂人’？”由此想来，香港电影《狮王争霸》当中，黄飞鸿、十三姨及一班新老人士，以“爱老虎油”（I love you）彼此寒暄的滑稽场面，恐非向

壁虚构。



(《狮王争霸》剧照)

在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语境当中，士大夫对于英语的复杂心态也历历可见。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壁，遥望中席，约有廿余人，曾侯与作夷语，啁啾不已。”曾侯正是晚清外交名臣曾纪泽，时人称他“于英、法二国语言皆能通晓”。而对于不通英语的翁同龢而言，“夷语”确实也像鸟语一般啁啾难听。讲又不能讲，听又听不懂，翁同龢只能一边知趣地退避西壁，一边不甘心地引颈遥望。其实，教过曾纪泽英语的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回忆，曾纪泽的口语“流利而不合文法”。曾氏也坦承：“余能西音，然在湘苦无师友，取英人字典钻研逾年，事倍功半。又年齿渐长，自憾难记而健忘，一知半解，无可进矣。”他佩服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学

习英语“甫期年已能通会，再加精进，必可涉览西书新报之属”。



（《曾府三杰图》左为曾国荃，中为曾国藩，右为曾纪泽）

曾纪泽的真实感受，想必是士大夫初学英语的普遍困境。而郭嵩焘出使英国不到一个月，即断定“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但“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或许仍旧代表读书人对于中西文化的褒贬态度。难怪到了1931年，前辈诗人陈衍得知钱钟书的专业是外国文学，还要大发感叹：“文学何必向外去学，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么！”不过，就在曾纪泽“将昔日所译《英话正音》抹去华字”，以检测自己英语“记忆之功”的时候，李鸿章开始为格致书院出题，询问学生“能详溯西方格致学之源流欤”。随后，湖南人谭延闿在日记里发愿，“此后字课、英文当与盘马并为三”。末代皇帝溥仪也在外国老师庄士敦的指导下，苦练英文书法。在山雨欲来的20世纪前夜，“啁啾不已”的“夷语”，给

近代中国带来了“伯理玺天德”(president, 总统)、“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 灵感)和“勃兰地”(brandy, 白兰地酒), 也掀起了改变读书人知识、思想和心灵世界的激荡风雷。

本文选摘自《读史早知今日事》

段炼著

九州出版社2015 年出版



蒋介石对日本的爱恨情结

◎陈三井/文

在近代中国的军政领袖人物中，毫无疑问的，蒋介石是对日了解最为深刻的一位。这一方面由于蒋曾留日学习军事，民国初年又曾两度赴日本居留达三年之久……

在近代中国的军政领袖人物中，毫无疑问的，蒋介石是对日了解最为深刻的一位。这一方面由于蒋曾留日学习军事，民国初年又曾两度赴日本居留达三年之久，对日本的立国精神与建国过程，下过一番研究的工夫。另一方面由于蒋氏在参与及领导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有数度直接与日本当局接触的经验，也曾不止一次地派遣专使到日本去做缜密的考察，这都使蒋介石对日本的国力与军国主义兴起后的侵略本质，有深刻的体认。



（1910年，蒋介石留学日本军校期间着和服与同学张群合影）

蒋介石早年留日的学习经验,根据黄自进教授的研究,对蒋本人至少有四点重要影响:

(1)培养坚忍不拔的人生观

蒋自认为他之所以能于简单的生活以及对工作能持之以恒,实得力于在日本严格、枯燥的军队生活,锻炼出他不畏艰难、勇于面对挑战的个性。

(2)体认到全民军事化的重要性

蒋于1930年代在中国所推展的新生活运动,其目的即在追求中国国民生活的军事化,唯有国民军事化,才能在短时间内加强中国的动员力量,加速中国的现代化。

(3)主张运用科学知识重新验定传统生活习惯

从他主张吃够不一定意味着吃饱,多食容易导致疾病以及在日本联队受训过程中吃不饱的经验,到理解节制是养生过程等范例,无一不是反映他的日本经验。这些经验自然也蕴涵着日本运用现代化的科学观念,推动社会习俗改革运动的成效。

(4)强调实践,奉行“知行合一”学说

这些理论虽然是阳明学说的真谛,但也是他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的观察所得到的新启发。

蒋介石所津津乐道的日本学习经验甚多,包括军队训练的严格、生活的勤劳节约、军人的绝对服从等,对蒋氏日后的建军都有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完全以“日本为师”,这方面黄自进已做了地毯式的爬梳,在此不赘。

蒋介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是个讲究孝道、

师道、友道的政治人物。他的对日观，同孙中山一样，是发自内心的爱，从佩服和推崇的角度出发的。他在日后与日本政治人物的谈话中，一再这样表示：

“中日两国无论在种族文化地理人情各方面，皆甚亲近，而且在历史上中国与英、美、俄、法等西洋各国之关系，皆不如与日本关系之长久而亲密。”所以他坚信，“两国之间没有不可解的纠纷，没有不可了之事”。

他曾明白告诉日本记者，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进步之速及一般国民忠义孝友之德，礼仪勤俭之风，向所钦佩。他进一步对日本的古今人物，像维新以前的赖山阳、维新时期的胜安房与吉田松阴二氏表示钦佩。



（蒋介石留学日本意气风发）

蒋介石认为，日本之强盛在于他的工业化以及吸取中国王阳明的实践哲学，他很推崇日本的“武士道”，特地指出，日本之国魂，即为“大和魂”，“大和魂”所表现的精神，即是“武士道”。“武士道”讲究“忠君爱国”、“好侠尚义”、“轻生乐死”。这些特质都有助于日本建构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当然更有助于建设一个军事强权。而塑造日本民族成就这样的特质，实际上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尤其是阳明哲学中所倡导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实践精神。

同孙中山一样，蒋介石对日本的想法也是双重性的，爱与恨纠结，几乎同时并存的。这是历史造成的时代悲剧！将日本视为一个对中国具有领土野心的帝国主义，是蒋介石自青年时期以来就秉持的看法，认为日本视满洲为禁脔，中国在无完全准备之前，不应轻易尝试解决满洲问题，这是蒋在1921年向孙中山提出北伐建言书中的一个重要观念。根据这一理念，他主张国民党在北伐过程中，不应将张作霖列入作战对象，以免刺激挺张的日本政府。换言之，蒋对日本在中国东北之殖民经营野心，了若指掌，因而不愿轻举妄动，以免挑起和日本的冲突。

1926年，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在北伐过程中一再遭到日军的挑衅。从翌年的“五三惨案”开始，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对日军师出无名在先，滥杀中国军民于后，公然在中国领土行暴，自然痛心疾首，引为平生奇耻大辱，视为“国耻”、“军耻”、“民耻”，自此由爱生恨，激发出一股强烈的雪

耻之念。蒋在日记中，每天必做自强雪耻之警句，以为自励自惕：

5月4日：“日人侵侮我至此，实难忍受！”

“济南军民，对日军之惨杀，无不义愤填膺，目眦欲裂。”

5月7日：“日本军阀心毒狠而口狡诈，若其政治家再无远见，吾诚为日本国民危也。”

“哀哉！国未亡而亡国之惨祸已见矣！”

“惨毒苛暴之威，岂能慑动我哉？”

5月9日：“如此横暴，虽亡国之民，亦难忍受也。”

“悲乎！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

“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任务，余今且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可耳！”

“国耻、军耻、民耻，何以雪之，可不勉哉！”

5月10日：“土地任人处分，人民任人惨杀，亡国之惨痛，极矣！”

“对于日本，凡可忍辱，且暂忍之，必至最后忍无可忍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与之决一死战云云。”

“五三惨案”予蒋介石的打击最大，但在衡量当前情势下，蒋在与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王正廷等党政要员彻底计议后，决定对军事暂取不抵抗方针，先

礼后兵以观其后，而迅令各军全部渡河，继续北伐，以集中全力完成革命为目前唯一方针。而蒋本人自己则决定，每日六时起床，必做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后为止。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蒋介石发表讲话）

及至1934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蒋介石亟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嘱陈布雷笔录，撰《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但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陈布雷的名义出之，乃用徐道邻名义刊载于《外交评论》（The Foreign Affairs Review）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这是一篇语词含蓄而用意深长的论文。文章一开头，首先定调说：“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

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对于中日僵局的造成，中日两国均有责任，但“中国方面有十分之四的责任，日本方面至少也应有十分之六的责任”。因此，中国需要检讨自身的错误与失计，日本尤应承认其“直接的对中国认识的错误”，与“间接的国际间举措上的错误”。作者特别指出，日本对中国国民党之观察，犯了两种错误：其一以为中国国民党是发动排日势力的中心；其二以为非打倒中国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其次，日本人拿蒋介石与袁世凯、李鸿章相提并论，也是一种错误，因为两者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环境不同，即其所处的时代绝对不同。以袁、李的习性与识见来推断蒋氏，有如“老子与韩非同传”一样的滑稽。

《敌乎？友乎？》一文的结论，归结到中国的一句古语：“解铃还须系铃人。”希望日本勇于检讨，接受错误而改正，以悬崖勒马的勇气，担当起打开中日僵局的责任，谋求久远的和平。后来陈布雷回忆此文之主旨，曾谓：

此文之作，盖欲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识东亚安危之至计。为日本彷徨无主之国论辟一新视野，而痛斥其野心军阀之无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缓其凌逼之气势也。

五、余论

可惜的是，中日僵局始终没有打开，日本军人也并没有悬崖勒马，东亚风云完全变色，最后演成一场玉石俱焚的大悲剧，日本因侵华战争与发动珍珠港事

变，终于兵败投降，自食苦果。中国也因为抗战八年而兵疲民困，而损失惨重，而元气大伤！



（抗战中的蒋介石）

蒋介石对日本苦口婆心的劝告，最后是失望了，中国人也失望了，但终战后蒋介石却不念旧恶，“以德报怨”，化民族国家之恨为至高无上的爱，“与人为善”，对日本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宽大政策。其内容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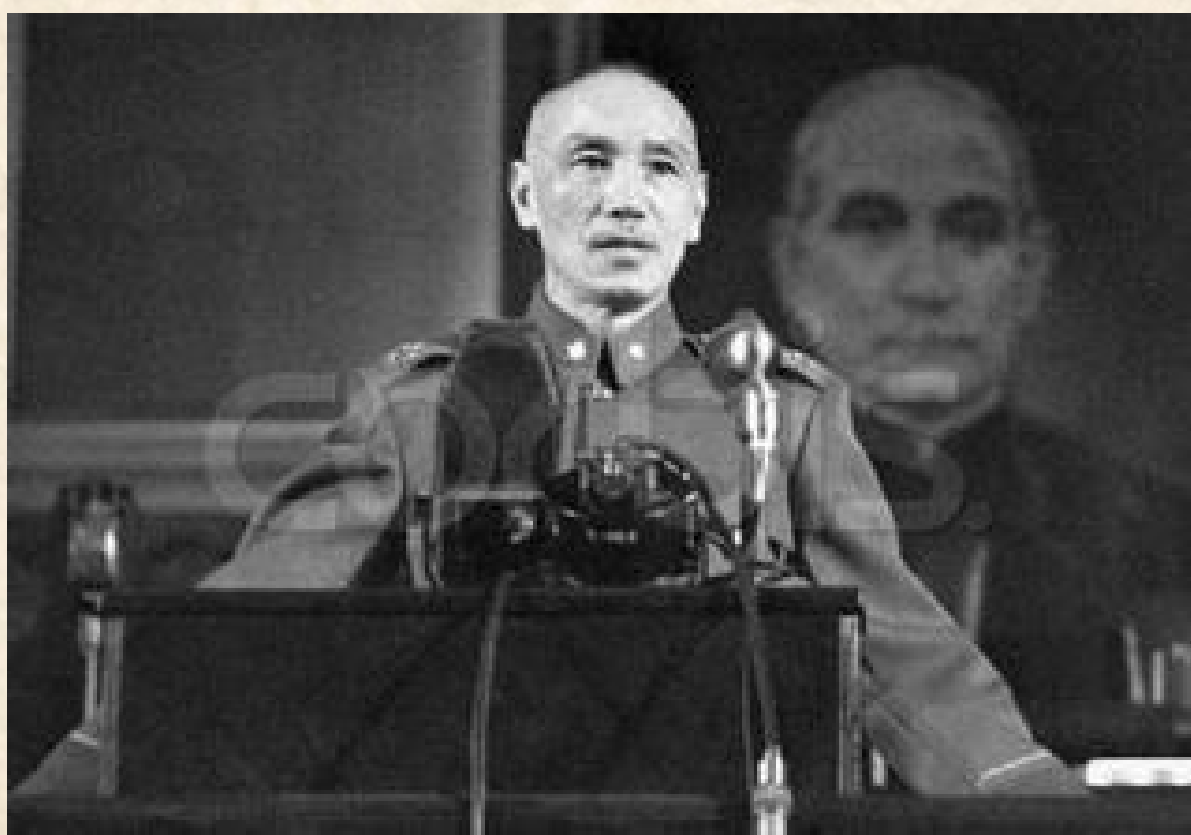
- （1）维持日本天皇制度；
- （2）反对列强瓜分日本；
- （3）迅速将二百多万的日本军民送还其祖国；
- （4）反对报复性赔偿。

是什么力量，怎样的考虑，促使蒋介石对日本采取“不念旧恶”，表现“大爱精神”的宽大政策呢？

首先，最基本的因素，当然在于以儒家思想中心的东方文化。东方文化的本质，一为仁爱，二为忠恕。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蒋介石，一直是东方文化与传统道

德的终生服膺者与切实践履者。诚如日本国会议员滩尾弘吉所言,蒋之所以采取如此宽大的对日政策,“决非基于战胜者对战败者的随兴的宽容或怜悯,而是由于中华民国建国的理想。此一理想是植基于中国固有的儒学思想,发自深远的哲理”。

其次,蒋介石对中日合作的信念与希望,在他的一生当中,无论遭遇任何情况,都是始终一贯,绝不动摇的。他对日本的爱,是出自兄弟之邦的感情,源自生活经验的体会。他对日本的恨,则是基于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爱恨之间,虽时有矛盾纠葛,却并非不能切割的。蒋介石对日本的爱恨情结,不仅是他个人的对日情怀,同样也可以用来表达所有中国人的对日情怀。因此,对于败战后日本的措施,蒋认为“战争是日本军阀发动的,不是日本国民之罪”。所以谆谆说服联合国其他领袖,亲自率先垂范王道的襟度,为日本的复兴,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宽大政策。



(蒋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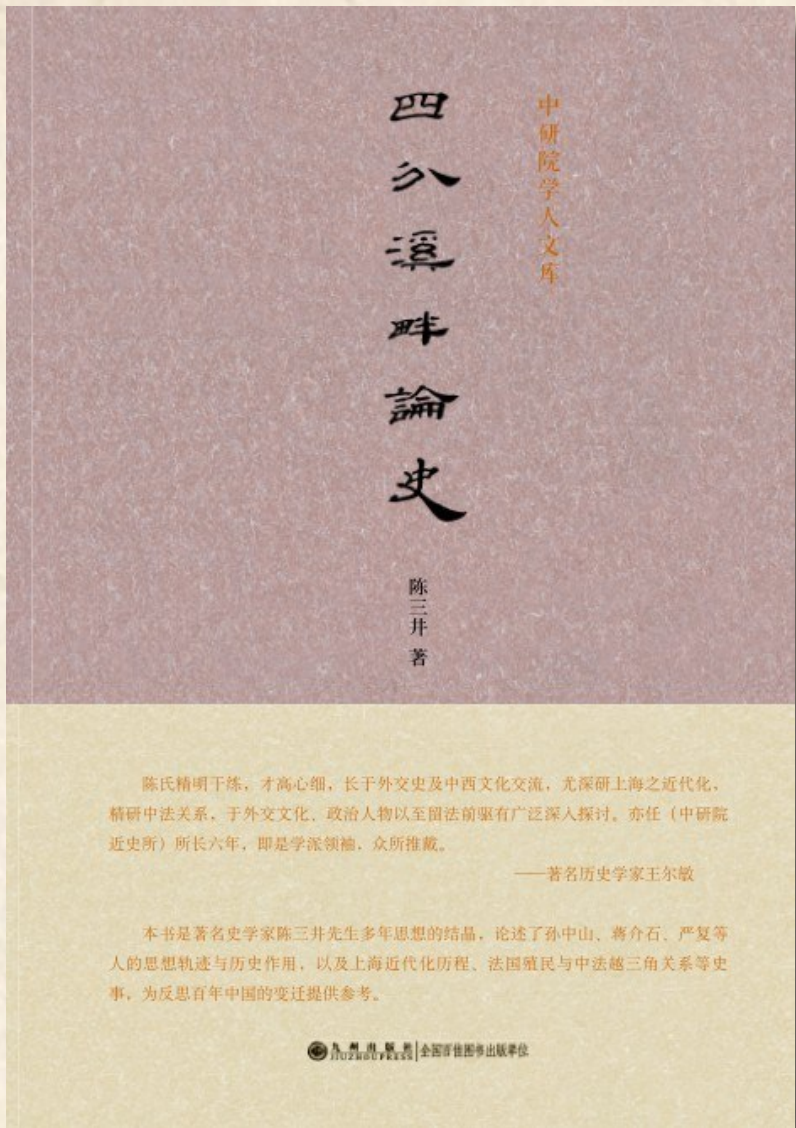
中日学者对“以德报怨”政策有不同的解读。台湾的黄自进教授认同此一观点，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对日本宽大为怀，是因为他自始就不以日本国民为敌，只要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阀一灭，中日两国绝对可以化敌为友，不仅可以化敌为友，而且日本还会唯中国马首是瞻。特别是两国在战前就是以反共为国策，战后更应在反共的前提下合作无间。日本的家近亮子教授则认为，蒋介石所决定的放弃战争赔偿索取这一政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阻碍了中日战争真正意义上的结束。它使日本的战争责任，集中在不具备实质内容而且口头上的“反省和赔罪”上，其结果，战后处理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国经常要求日本在口头上表达“反省和赔罪”，以加深“历史认识”。

是的，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世上没有永久的敌人，中日两国之间没有不可解之纠纷，也没有不可了之事。蒋介石主动抛弃过去的恩怨，在战后挺身而出，做了一次“解铃人”，主动化解了中日两国纠葛半世纪的爱恨情仇，为日后的中日亲善，甚至中日复交奠定了基础，也为亚洲的和平、安定与繁荣，开启了一扇“友好之门窗”。

推荐阅读：《四分溪畔论史》

陈三井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史学家陈三井先生多年思想的结晶，论述了孙中山、蒋介石、严复等人的思想轨迹与历史作用，以及上海近代化历程、法国殖民与中法越三角关系等史事，为反思百年中国的变迁提供参考。



实干家曾国藩的几道奏折

◎ 刘绪义/文

曾国藩在坐了十年冷板凳之后，初次具有直接向皇帝上奏折的权利，自然格外重视。这道奏折写于三月初二……



曾

国藩眼里那个“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的世界能否改变呢？答案显而易见。但作为朝中大臣，曾国藩试图以传统的方式来改变它。

他的努力应该从道光末年算起。

具体说来，根据清朝体制，曾国藩真正参与朝政，是在道光三十年开始的。从保存下来的资料来看，曾国藩在这一年里总共上了四道奏折，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上文提到过的《应诏陈言疏》。

曾国藩在坐了十年冷板凳之后，初次具有直接向皇帝上奏折的权利，自然格外重视。这道奏折写于三月初二，虽然这一年的年号是道光三十年，实际上，道光皇帝旻宁早在这一年的正月十四就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驾崩，享年六十七岁。道光去世后，皇四子奕訢继皇帝位，年号咸丰。奕訢继位时刚好20岁。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新皇帝甫一上任，即降旨命文武百官上书陈言，以昭示新皇帝想要有所作为。



（咸丰帝）

比新皇帝年长一倍的曾国藩，时身兼礼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两职。在这道奏疏里，曾国藩并没有谈及自己主管的工作，而是以三千字的篇幅专谈人事问题。从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来看，曾国藩堪称政治家；从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看，曾国藩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人才问题自古以来是众多政治家们首重的大

事。周文王为了兴周灭商，破例收纳了年近七十的姜尚；汉刘邦为灭暴秦，破常规重用无资历的韩信为大将；三国时刘备欲鼎足而立，三顾茅庐访诸葛；唐太宗图兴大唐任用魏征为相……都是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不少枭雄豪杰不惜心力搜罗人才，收买人才，后世统治者兴科举亦无不是着意于人才。然而，自古以来，能把人才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不多。历史上对人才的重视也基本上停留在“伯乐相马”的阶段，真正把造就人才摆在国家大事面前，曾国藩算是第一人。

著名的“伯乐相马”说的是识人之术。许多礼贤下士的做法无不是出于个人利益，或是为实现图霸天下之志，或是为谋个人地位权势而网罗死党。曾国藩首次把造就人才摆在国家的高度，提出造就人才的三大途径，正是他谋划改变当下那个“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的世界的尝试。

认识到人才问题是改变现状的核心问题，这是曾国藩眼界高于前人与同时代人的显著特征。他的预见力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这既是一句不祥的预言，又把人才问题摆上了国家的高度。这一严峻的现实与事后的应验，足见这个副部级干部的惊人洞察力。那么，如何造就人才？曾国藩向新皇帝提出“转移、培养、考察”三种方法。



所谓转移，其实就是影响，亦即通过领导的表率作用来影响其他人。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人才的造就与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特别是世风对人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培养，具体说来又有四条举措。一是教诲，即对下属的行为做出适时的评价，或褒或贬，或奖或罚；二是甄别，即区别良善，去小人而存君子；三是保举，即对优秀人才予以恰当地使用；四是超擢，即为打破常规，破格使用人才。

所谓考察，就是识人。怎么识人呢？曾国藩在这一奏折里提出“询事”（问事）与“考言”（言论）二者并重的思想。曾国藩特别重视人才的言论，一个人有没有才，可以从他对某事的看法上得以认识。一般的事是难以识别人才的，“小者循例，大者请旨”，小事有例

可循，大事则只能由皇帝定夺，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言为心声，考察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既可观其识见、思想，又可见其条理。而一个人的言论既可从他的话语里得知，有的人可能不善言语，可能惧于天威，不敢言语，则可以看他的书面功夫。因此，“少大言而多条理”，也就成了曾国藩甄别人才的一大方法，同时观其奏折，亦可见其言论思想（“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之心”），故曾国藩自己就特别重视奏折的写作，他写的奏折有“晚清天下第一奏折”的美誉。

无论是论情还是论理，这道奏折肯定打动了青年皇帝，他在上面批了一段很长的朱批，称道“剴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他还希望借此能使大小臣工“激发天良”。受此鼓舞，曾国藩不久又连上几道奏折，其中最为震撼的还算《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这道奏折仍然继续了前一道奏折关于人才培养的问题。其时，广西已经爆发了洪秀全事件。曾国藩提出：“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这是他首次对洪秀全案发表看法，并提出了对付洪案的谋划。在奏折中，他替新皇帝安排人选问题——姚莹是一个年近七十的人，因其曾立勋名，此人宜加以威望，参赞幕府；严正基位卑不宜办理粮台。对派出的将领，曾国藩提出应分兵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门对付武昌敌军，西路专力南宁、太平四府，东路专办七府一州，钦差大臣应驻横州，这样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应设在梧州，银钱先屯桂林、肇庆。这一布局，其实已经可以看出后来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关于

位置人才，曾国藩指出：“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作为一个京官，曾国藩却能识天下地理，亦见其不凡。



但这并非这道奏折的主旨。紧接着曾国藩话锋一转，即照应本题，直陈新皇帝的三大流弊。

这三大流弊是“琐碎气”、“文饰气”、“骄矜气”。“琐碎气”实际上道出了皇帝无长远规划，没有从国家大计出发，而是沉湎于细枝末节上，与皇帝应把心思用于对大局的深谋远虑上不相适应，进而把广西洪秀全案处理不当的责任归咎于这位年轻皇帝。所谓“文饰气”，实际上是指责皇帝浮而不实，尚虚文，年纪轻轻的就想出诗文集，比他的祖上乾隆更甚。所谓“骄矜气”，意指新皇帝喜好媚软圆滑之人，而对那些劲节刚硬的大臣疏而远之，导致广西事变久拖不决，军情紧急，皇帝一手操其权，而使满朝文武不敢分其劳，这些都是皇帝骄矜之过。

事实上，曾国藩道出的这三大“流弊”无一不切中

要害。古往今来,敢如此大胆放肆,直陈皇帝这么多过错的人不多,而且实为大不敬,怎么可能不令皇帝恼羞成怒。于是,年轻皇帝写了一大段话来为自己辩解: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

看得出,年轻皇帝对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是咬了牙的既恨又羞,以至于不得不想尽办法为自己开脱,绝不承认“骄矜”这一指控。实际上,承认最后一条比承认前两条有难度得多。历代帝王都不会甘心承认自己有骄矜之气的,充其量说自己过于自信罢了。承认琐碎,可以表现一代帝王事必躬亲的勤勉之态,尚文饰可以说明一代帝王重礼仪有好美尚古之心,无可非议。而承认自己骄矜岂不大大地挫伤帝王的自尊心吗?其

实，青年皇帝也并非不知，承认骄矜无非只是个人的习性罢了，而要承认自己没有国家大局眼光，做事不踏实，则实实在让人考虑他是否胜任皇帝这一角色了。恰恰在曾国藩看来，这二者正是时局之大者。要改变这个黑白不分、无关痛痒的局面，首先就得从皇帝着手。

然而，曾国藩试图通过上书直谏的传统方式一举扭转风气的做法彻底失败了。年轻的咸丰帝读完此折大为震怒，一定要查办曾国藩。幸有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两人上疏求情，才打消了皇帝的念头。



清末年画《曾国藩庆贺太平宴》，正中榻上坐着李鸿章（左）和曾国藩（右），左边从左至右依次为左宗棠、骆秉章，右边坐着彭玉麟、曾国荃等。资料图片

（清末年画《曾国藩庆贺太平宴》，正中榻上坐着李鸿章（左）和曾国藩（右），左边从左至右依次为左宗棠、骆秉章，右边坐着彭玉麟、曾国荃等）

不过，曾国藩并没有死心。时隔几个月，他又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

大概是汲取了前一道奏折的教训，这一次曾国藩

隐去了直接针对皇帝的言辞，而一意着眼于民间和官僚作风。但他的主旨并未改变，一开始仍然针对民心世风：

臣窃闻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特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

接着他陈述了“民间三大疾苦”——银价太贵，盗贼太众，冤狱太多。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赋税沉重，百姓不堪重负，必然影响到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使得一些人铤而走险，盗贼丛生，反过来既影响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又意味着官府无力处置，冤狱无法得伸。而曾国藩所说的银价太贵，恰恰是国内白银外流之后国库空虚的直接反映。可想而知，这些问题，岂是曾国藩一道奏折能解决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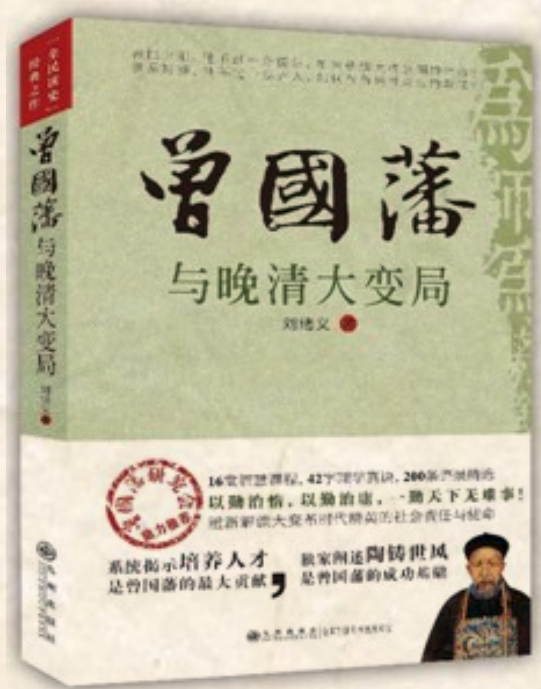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国藩的这些奏疏并没有起到任何实际作用。他乐此不疲的目的，恐怕也并非不知道其中因由，而是有着更深的用意。用他的老友刘蓉写给他的一句诗来说就是：“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也就是说，这些奏折、这些举措的实际意义在于为曾国藩赢得了海内人望。中国自古以来对于直言纳谏的官员就报以民间的尊重和钦仰，所以曾氏的奏折很快就能被广为传抄，受到了士林的重视。储才养望，这可能是曾国藩的真正用意。或者更深究一下，这正是曾国藩为扭转世风所做的一种努力，而且是

一种舆论上的努力。从曾国藩的性格来讲，他这样做，又是偶尔露峥嵘的表现。自此以后，他再也不谈这些宏观上的意见。朝廷又回归万马齐喑的是非不分、无关痛痒的局面。

本文选摘自《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

刘绪义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作者于《曾国藩全集》中撷取第一手可信材料，通过思辨及梳理，将读者带回十九世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围绕“权力”与“修养”这两个重大问题，揭示了曾国藩成功的真正秘诀，还原了曾国藩领导艺术的魅力。

同时，作者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迷雾，从为师为将为相到治国治家治身，系统阐述了曾国藩一生的意义在培养人才与陶铸世风。因此，这既是一部全新视角研究曾国藩及晚清历史的专著，也是一部领导干部可资镜鉴的枕边书。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文字校审:@沧桑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王浩鹏
文稿整理:@冯冯
统筹:@一木

【往期下载地址】



Copyright ©2015 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Email:duxiangtuan@jiuzhoupress.com(投稿、入会)
企鹅:2635599399

春分

